

黄植生平

张克明 辑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顾问，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副省长级离休干部黄植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在西安逝世。享年77岁。

黄植同志是广东省龙川县人，1915年9月出生于广州市。少年时期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小、附中上学。1931年11月在广州中山大学组织抗日剧社，1932年初参加革命，在左翼剧联广州分盟工作。1934年5月因该剧社遭敌人破坏，他转移到香港九龙智仁勇小学任教，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9月到上海参加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沪情报组，后因该组织遭破坏，于1935年3月去北京，1936年5月又返回上海，经组织介绍进入陕北苏区。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历任工农剧社主任、中共中央党

报委员会出版发行科科长、中共绥德地委《抗战报》主编、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共绥德地委秘书长，1946年至1954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历任秘书、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秘书长。1955年1月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处长。1956年1月到1960年10月在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任部务委员、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后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财委副主任。1965年2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受迫害被下放到辽宁省岫岩县朝阳公社孟家生产队劳动。1972年10月回到沈阳市委，1973年3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1977年3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1979年3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2年8月，积极拥护中央关于干部制度改革的决策，申请辞去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长职务，任中共陕西省委顾问。1983年4月任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1990年9月离休。

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是黄植同志最可贵的革命品格。他自幼就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少年时期即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言行，始终不渝地把自己的生命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不论革命事业处于高潮还

是低潮，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西北局任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间，黄植同志代西北局起草了大量的政策性文件，其中不少结合西北地区特点的报告和材料经党中央转发各地。三年困难时期，黄植同志在东北局财委工作，为了掌握实情，他带领机关干部深入最基层，一面调查研究，一面具体安排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疾苦。“文革”中，黄植同志遭受迫害，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摧残，但他对党的信念矢志不移。并以此信念教育子女相信党、相信人民。1973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投身财贸战线的各项工作，努力恢复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以实际行动与“四人帮”进行斗争。1979年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几年中，他不顾虚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组织开展生产力标准大讨论，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工作，得到省委和中宣部的肯定。1982年黄植同志到省顾委工作后，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使命感，坚持开展调查研究，在重大问题上向省委

提出工作建议,充分体现了—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品德与胸怀。

鲜明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观念是构成黄植同志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重要特点。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批评。对于有损于党的形象的言论,他深恶痛绝,坚决批驳,从不让步。在他主持省委宣传思想战线工作期间,多次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无条件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必须以自己创造性的工作来体现党的“喉舌”作用,整个宣传思想队伍必须保持高度的纯洁性。就是在他离休以后,心里考虑最多的仍然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经常拖着病躯来机关查找党中央和上级部门的有关文件以及有关的学习资料,反复学习研究。并经常注意了解基层思想动态和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反映。病重期间,他依然让人搀扶着来机关坚持过组织生活,询问党和国家大事,坚决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了解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后宣传思想工作方面情况,堪称老共产党员的楷模。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是黄植同志的一贯操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

黄植同志工作多次变动,但他从不计较,自觉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同时要求家属子女立党为公、以优异的工作成绩报效国家。他平时生活简朴、反对奢侈和浮华,不搞特殊化。他对子女立的“清规戒律”是全靠自己的本事和能力为党和国家做事,各奔前程,绝不能靠老子,靠关系。就在他病危期间,还坚持不要子女请假回来看望他,怕影响他们工作。黄植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做出了自己的全部奉献,走完自己光辉的一生。黄植同志的高贵品德和优秀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附识:

黄植同志逝世后,他的上级领导撰写他的生平,分送他的生前友好。文字虽不长,但对黄植同志革命的一生,作了全面的概括和高度的评价,是一篇很好的资料,这篇文章是黄植同志的夫人史宏大姐寄给我,由我转寄龙川党史办的,为什么我要转给龙川党史办呢?有一段情节得说一说。

黄植同志兄弟姐妹一家人,都是很早参加革命的,他的父亲黄雨村是龙川瑶头水村人,他早年在广州珠光路开一间小店叫粤昌,他的子女都是在广州长大的,龙川客话只能听,不能讲,可是他们对龙川故乡很有感情。龙川党史办知道我和他们有交情,托我向他们要点革命史料如回忆录或传略之类。

黄梅棣(黄纪)先辈,我曾请她写点参加革命的经历,她不肯,说没有什么贡献,不肯写,以后她去世了,我参加追悼会,只好将一份黄

纪同志生平，寄给龙川党史办。

1991年秋，我去陕西视察，正是一个请黄植写生平事迹的好机会，我与黄植都是1930年秋读中山大学高中部一年级的，我读高中部文科班，黄植（黄志潜）读理科班。整个高中部才两个班，八十多人，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游玩。黄植聪明活泼，蹦跳逗趣，惹人喜爱，我们叫他“魔 King”。以后，黄植参加抗日剧社，搞学生抗日运动，到大学农科二年级时，便离开广州到西北做革命职业家了。

黄植知道我到了西安，非常热情，由他的夫人陪同扶杖进宾馆来看我。半个世纪没有见面，相见之下，彼此大吃一惊，他变得是一个行动迟缓的老者。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我们谈得很高兴，我应约又到他家吃一次丰盛的晚饭。我乘着酒兴，又把龙川党史办的近年工作成绩说了一阵，再一次请他写他家人及他自己的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他的态度没有变，仍然说没有什么贡献，不肯答应。直到我们分手，他蹒跚地送我出门外时，都感到此别之后，不知何年再见了。我再一次请他写文章，他似有安慰我的样子，说身体好些时，由他的夫人帮助，试写一点吧，于是我满怀希望。

过了一年的光景，突然接到他夫人的来信，拆开一看，就是这篇“黄植同志生平”，为之愕然，悲痛不已！

张克明

1994年5月8日于北京

平凡而有独特贡献的 共产党员黄用舒

张克明

大革命失败后，龙川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三十年代，重新建党。在这过程中，有一位普通的而又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的共产党员，他就是黄用舒同志。

黄用舒是龙川县老隆镇水贝人，家世显赫，父亲是出身秀才的知县，堂兄是地方绅士，二堂兄是十九路军中将军参谋长黄强，可谓是有名有势的地方实力派。用舒本人又是大学毕业生，专攻农科，学有专长，但他不凭借家族权势走升官发财之路，却宁愿在乡下办小学，做小学校长。在老隆还当过区长、电话局长、税捐处长这些国民党政府的小差使。他生活朴素，作风正派，抨击时弊，热心公益，接近下层。有时，一个人静静在东江河畔钓鱼。他给人以“出淤泥而不染”的形象和性格独特的感觉。

我和黄用舒认识是在 1935 年的初夏，是杨家桦

(友池)介绍的。黄用舒对乡中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从龙川到广州来想找些志同道合的人以改变龙川的面貌。经过一番辗转介绍,杨家桦带他来中山大学宿舍相见。1928年龙川农民起义时,四甲和田心屯两村发动最早。失败后,牺牲的人最多。因此,黄用舒对这两村的人,有一个很天真的看法,认为这两村的人都是好人。我是田心屯人,他对我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越谈越兴奋,话题很快谈到办秘密刊物,抨击乡中时弊的问题。他马上拿出十元作印刷费,要我和杨家桦组织稿件。他不仅提供材料,而且还写了短评。杨家桦把稿子寄给上海读书的刘绍铭,由他印发各地的同乡,特别是在广州的同乡。这就是震惊一时的秘密刊物《火焰》。由于我们初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文字写得很激烈,火药味很浓,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龙川的人物。

《火焰》的出版在1927年以后白色恐怖、万马齐喑的龙川,如同发出一道革命思想的火花,谁能猜到举起这火把的人,正是黄用舒呢!

1928年春,龙川农民起义,建立人民政权,但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扑灭了。共产党员黄克、叶卓……等革命首领壮烈牺牲了。从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的漫长岁月内,党的组织出现了断层期。在龙川,

把红色种子引进来的拓荒播种者，不是别人，正是黄用舒同志，这又是谁也猜想不到的。

广州市南关珠光路，有一间粤昌小客店，是龙川人常去谈论时政的地方。店主黄雨村为人开明而好客，他的儿子黄志潜（黄植）、女儿黄梅棣（黄纪）都是进步青年。黄用舒到广州，总是找黄梅棣讨论时局。《火焰》出版后，黄梅棣对黄用舒有进一步的认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黄用舒觉得龙川的工作应有党的指导，因此，向黄梅棣提出请她介绍一位好同志来龙川工作。1938年春，刚从延安学习归来的麦文同志，便带着黄梅棣的介绍信来到龙川。麦文是黄梅棣向党组织提出后，由广州党组织派来的。黄用舒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为麦文同志安排食宿，安排公开职业作为掩护，并介绍进步青年与之接触，作为发展的对象。但麦文首先发展的对象是黄慈宽，是龙川县的又一颗红色种子。从此龙川县的党组织就建立起来了。不久黄用舒亦入了党。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龙川的党员发展很快。党员多了，黄用舒的工作更忙了。他为地下党员找职业作掩护，安排在老隆区政府、学校、电话局、税务所工作。1940年冬，他索性自筹资金，办一间“星光染织厂”，不仅解决了党

员的食宿问题，还成了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地下交通联络站。

自龙川建党到解放战争这十年时间，黄用舒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老隆水贝的莲塘乡，建立“外白内红”的两面政权，由优秀的党员任国民党的乡长。尽管老隆军警林立，可是因为有了这条“地下航道”，地下党的指挥员、战斗员、交通员经常来往，携带文件物品、武器，都十分安全。在这些方面，黄用舒起了极大的作用。黄用舒为地下党建立电台，探听敌情；为香港沦陷后来到老隆的文化人及爱国民主人士提供方便，特别以老隆区长的名义给廖承志写通行证，并运送行李；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担保被捕的党员及一些党员的家属出狱；在解放前夕，为一部分游击队伍提供食宿并作掩蔽。他起到别人难以代替的作用。其中情节曲折、离奇、惊险，颇具传奇色彩，就不在这里细谈了。

这里我只想谈谈与我有关的“陶女事件”问题。“陶女事件”是在国民党反共逆流高潮中出现的。在这期间，廖承志被捕，粤北党组织被破坏，时间为1942年。

“陶女事件”是这样的，由刘波吸收入党的文化水平很低的女子陶五娣，因不满旧式婚姻，经党同

意，逃婚了，由张修带到我老家住过几天，再由张修带去叶潭与人结婚。婚后陶回家探亲，在家人追问下，她就将内情和盘托出。家人向国民党县政府、专署告发。专署要龙川县政府逮捕有关人员，企图一网打尽，彻底破坏地下党组织。龙川县政府马上逮捕了刘波、叶观渭和我三人。在看守所里，彼此不能见面。本来看守所中，有一位干事是党员，刘波叫他通知我快逃走，但来不及了。

我一到龙川东坝看守所，国民党县长邓鸿芹就打电话给我，说此案是陶五娣告发的，说现在晚了，明天来看守所告知详情。我马上感到，此案只要张修逃脱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县政府将会在这二十小时内逮捕张修的，时间紧迫，十万火急，如何通知张修呢！

忽然，黄用舒以老隆区长名义来电话。此时，我刚进看守所，所长邓贵良是老同学，对我很客气，任由我与黄用舒随便通话。我说案子是陶五娣逃婚事件，张修曾带她在我老家住过几天。黄用舒知道张修原名张鸿贞，我就说，鸿贞在老隆生意难做，要他快点去别处为好。

黄用舒知道案情及关键所在，马上通知张修逃避，通知党员隐蔽。第二天一早，他从老隆来佗城东

坝看守所看我。我把此案及被捕人员的情况详细叙述一遍。黄用舒当着众人大声说,这是男女婚姻事件,不能小题大作,诬陷好人。他马上去县政府找邓鸿芹理论,争论得很激烈。

“陶女事件”一爆发,许多党员隐蔽起来,不再与我接触,避免嫌疑,是非常正确的。黄用舒和我交情甚笃,经常在一起,在一般人心目中,他是共党嫌疑分子,他应该避嫌,应该隐蔽,但他采取以进为退的方法,不是退下去而是挺身而出,为营救朋友而奔走呼号。这不但博得社会的同情,而且把党员的身份隐蔽得非常艺术。在重要关键时刻,黄用舒英勇机智,真令人佩服!

日子长了,黄用舒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警犬的注意,其中莲塘小学有些已离校师生参加地下游击队事,就足够引起他们怀疑的了。1946年冬黄用舒专程赴港,通过沙杰(黄慈宽)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并说明他自己的处境。领导认为龙川工作重要,用舒的社会条件好,可在龙川继续呆下去,只是对莲塘小学要公开表现疏远的姿态。

黄用舒很注意统战工作,利用他的社会地位,经常与政府、学校、社团的上层人士接触,做他们的知心朋友,赢得他们的好感。

黄用舒对他的堂兄黄太占的思想影响很大，黄太占在老隆有一商行——利丰行，曾有一段时间作为地下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点，掩护地下党员的各种活动。1948年初，黄用舒介绍地下游击队长黄仕标与黄太占正式会谈。黄仕标指出国民党即将垮台，希望黄太占不要为国民党所利用，要为革命做点好事。黄太占都答应了。以后果然做了不少好事，包括利用他自己的社会身份，保释一些被捕的地下党员和党员的家属。

1948年，蒋介石政府为了巩固它的后方，企图扑灭地下党及游击队。龙川县国民党反动势力，把矛头对准黄用舒，于是引出了黄用舒“单刀赴会”的惊险场面。原来，莲塘小学一些早已离校的老师和学生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因工作疏忽暴露了身份，国民党特务分子一方面秘告黄用舒等10余人为共产党，黄用舒为首；一方面在老隆水贝布置召开“戡乱剿匪会议”，邀请黄用舒参加。黄用舒若来开会，加以围攻，找到纰漏，当场逮捕；若不敢参加，则加以畏罪私逃的罪名，乘机打击其他党员。龙川地下党掌握了敌方的阴谋诡计。黄用舒认为绝不能躲避，不能给敌人以口实。他估计到敌方并没有抓到什么实实在在的把柄，而且他们内部也有矛盾，并不是铁板一块，“单刀

赴会”倒可以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

召开“戡乱剿匪会议”那天，有一二百士兵把水贝团团围住。会议在黄氏大宗祠举行。国民党的县长、三青团的干事长、联防剿共总队长、国民党书记长、老隆自卫大队长、乡长等大小头目都聚在那里。除了县长、三青团干事长外，其余的人都姓黄。

黄用舒在开会前夕，将形势严峻的情况告诉了黄太占。黄太占那天暗藏武器在两名保镖伴同下进了会场，黄用舒也暗带左轮手枪，坦然来到会场。

会议果然将矛头集中在莲塘小学和黄用舒。他们提出莲塘图书馆有宣传赤化的书籍，说莲塘小学宣传共产主义。黄用舒根据国民党教育部门的各级指示，并拿出事实，把他们驳倒了。他们又说黄仕标游击队里，大部分是莲塘小学的师生，你作为校长，该当何罪。黄用舒说明他是挂名校长，主要精力在税捐处，是否有师生参加游击队，他不知道，离了校的教师、毕了业的学生走什么政治道路，作为校长是管不了的，何罪之有！会场上说话的人多了，说师生赤化，校长有责，喋喋不休，咬住不放。黄太占突然把桌子一拍，大声说，黄埔军校的学生很多是共产党员，蒋委员长是校长，难道他也是有罪吗？会场顿时寂然。停了一会儿，座中有人说，都是姓黄人，不要伤了

和气，算了，算了。所谓“戡乱剿匪会议”就这样草草收场。黄用舒“单刀赴会”把敌人气焰压下去，真是智勇过人。

水贝黄氏家族就是农民革命的对象，黄用舒是知道的，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之残酷，他是亲眼目睹的。但黄用舒并不因此沮丧退缩，反而追求革命真理之志更坚。他在广东高师（中山大学之前身）读书时，就受革命思想陶冶，以后不断与进步朋友来往，遂产生如何与中共联系的要求。他和我相约，谁先找到党，就一起参加。他以我有何思敬、邓初民这么好的老师教马列主义而羡慕。那时日本宣传出版马列主义著作之风甚盛，日译的经典著作亦多，为了扩大学习面，扩大交游接触面，他去日本留学，直至1936年归国。

黄用舒拥护中共提出的“八一宣言”的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认为龙川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抗日游击战的用武之地，必须有党的领导。因此，他向黄梅棣要求有与党关系的人来龙川工作。在他掩护下，党的组织发展很快。

1938年秋，我从北方抗日前线回到龙川。其时李健行、张凤楼、刘汝琛等亦来到龙川。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必须扩大地下党组织。1938年底，我在龙川

入党以后，第一任务，就是吸收黄用舒入党。在地下工作时期，要找党的组织关系，是很困难的。黄用舒彻底背叛了他的封建家庭，实现了他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夙愿，其兴奋之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从1938年到1949年龙川解放，黄用舒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内的领导和同志非常清楚，并且给以充分的肯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用舒荣任老隆区长。他是学农业蚕桑专业的，后被任为县农业科长。他努力扩展蓖麻蚕养殖，在闲地、荒地广种蓖麻。1952年秋，我从北京返龙川省亲，黄用舒兴致很高，大讲种蓖麻的好处，托我带一些蓖麻蚕子送北京某一机关作研究资料。1958年秋我又返龙川省亲，这时反右已开始。黄用舒神情变了，忧郁迷惘，显示出内心的苦痛。他知道我在反右中没有问题表示安慰，但他不愿说他自己的事。

那次分别以后，他的右手抖得很厉害，执笔困难，即使来信，亦不发议论了。他离开龙川到广州住了一段时期，最后搬到深圳，住在他的儿子黄告平家。1979年黄告平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父亲病危，要他立即写信告诉我，说恐怕此生难以见面了。信收到时，黄用舒果然已去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龙川县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如果他地下有知，亦将感到高兴。作为他的老友在唏嘘叹息之余，特撰此文，以表纪念；并愿那种混淆敌我、诬枉好人的荒唐岁月，一去不复返！永不复返！

1994年4月定稿

附1：

黄用舒解放前(1900—1949)生平年表

1900—出生于龙川县水贝

1926—1936

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农学院蚕桑系技佐

茂名中学教师

德庆悦城师范教师

龙川铁场中学教师

东莞雁田农业技术指导员

龙川莲塘小学校长

1937—1939

龙川老隆抗日自卫大队长兼莲塘小学校长

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0—1943

龙川老隆区长兼莲塘小学校长

1943—1944

龙川老隆电话局长兼莲塘小学校长

1945—1946

龙川农业推广所主任兼莲塘小学校长

1947—1949.2

龙川县税捐处长兼莲塘小学校长